

# 俄罗斯童话

阿法纳西耶夫 编选

沈志宏 方子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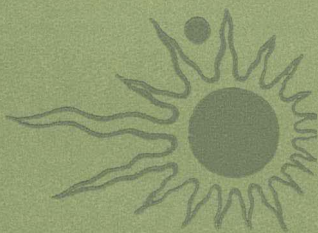


ELUOSI TONGHUA

上海文艺出版社

ELUOSI TONGHUA  
俄罗斯童话

阿法纳西耶夫 编选  
沈志宏 方子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红

封面设计：何礼蔚

插图：王志伟

## 俄罗斯童话

阿法纳西耶夫编选

沈志宏 方子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插页精 15 平 11 字数 350,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精 1-1,300册 平 1-5,400册

ISBN7-5321-0585-7/I·461 定价：6.80元(平装)

ISBN7-5321-0586-5/I·462 定价：13.10元(精装)

登记证号：(沪)103

## 阿法纳西耶夫和他的《俄罗斯童话》

著名的俄罗斯民间文学家阿法纳西耶夫的真正传记至今无法写成。他的一生中尚存许多不解之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往人们对他的评价大都是根据受检查的出版资料以及一些刊登在出版物上的有关他生平的片言只语所作。他在什么地方发表过什么文章，编过哪些集子，在他编辑的《图书论丛》上发表过哪些文献资料，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阿法纳西耶夫曾到过国外，访问过德国、瑞士、意大利、英国，他在伦敦见过赫尔岑，在那不勒斯曾为加里波第<sup>①</sup>的胜利兴奋不已，关于这些，虽也有人知道，但知者甚少。大多数人只知道阿法纳西耶夫的三卷集《斯拉夫人艺术创作中的自然观》（莫斯科，1865—1869）被同时代人看作是他的惊人之作。至于他的童话和传说，一向被人认为这是阿法纳西耶夫创作中的雕虫小技。

在对阿法纳西耶夫作过评论的人中，很少有人不提到这一点，认为他的作品脱离时代——读后使人感到迷惑不解、单调乏味。然而，这种议论丝毫没有损害阿法纳西耶夫的名声。事情就是这么怪，他并没有被人遗忘。

<sup>①</sup>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英雄，民主革命之翼复兴运动领袖之一。——译者注

历史学家们一直在研究考证阿法纳西耶夫编撰的文献资料,研究阿法纳西耶夫关于18世纪讽刺作品、彼得大帝书信及古代外交公文的论著,同时,他们也查阅其他一些带有详细注释的有价值的历史文献。阿法纳西耶夫对所有古代的东西都感兴趣,他有个经常去逛苏哈莱夫塔楼附近的旧货市场的习惯。他在旧货市场上购买到许多古代人的手稿和旧书。这些手稿和旧书便成了阿法纳西耶夫的丰富的、有价值的藏书,他从这批藏书 中摘录了大量对研究俄罗斯文化史有用的资料。

作为阿·谢·普希金的书信、诗集 的出版者,作为撰写评论尼·伊·诺维科夫、丹·尼·冯维辛、康·尼·巴立什科夫、亚·伊·波列扎耶夫和米·尤·莱蒙托夫文章 的作者,作为安·特·康捷米尔讽刺诗的评论者,文学研究者一直没有忘记阿法纳西耶夫的功绩。

民族学家们也在研究阿法纳西耶夫的作品。阿法纳西耶夫的作品论及古代的房屋建筑、鬼怪、巫师、法术、氏族、有关普扬岛的口头传说以及农民的形形色色的“神怪”观念等等。民族学家们从中找到了许多对于研究民族学极其重要的资料和事实。

诗人们对于阿法纳西耶夫的作品同样抱有极大的兴趣。像亚·亚·勃洛克、谢·亚·叶赛宁和阿·尼·托尔斯泰这样的天才作家都在《斯拉夫人艺术创作中的自然观》一书中获得了创作灵感的启迪。事实证明,许多经阿法纳西耶夫作了特殊的神话处理的文学形象影响了远不止上述几位作家的创作。这部作品简直迷人心窍!古代斯拉夫人的艺术幻想竟会改头换面地浮现在此书读者的想象中。当然,对于阿法纳西耶夫的某些解释可以见仁见智,但他对艺术创作的联想之广博,对民间语言的深邃含义之敏感却是无法否定的。在这位研究家身上诗人占了上风,他把直觉作为自己的工具,把科学解释融会贯通于艺术创作之

中。表达的技巧、敏锐的悟性、大胆的比喻——这就是阿法纳西耶夫吸引艺术家们的地方。在所有的专业书籍中，阿法纳西耶夫的《斯拉夫人艺术创作中的自然观》几乎是一部最富有诗意的作品！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于1826年出生于沃罗涅日州博古恰尔镇的法院监察官家庭中。父亲很敬重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他自己“穷得只上过几天学”。他以自己的聪颖在博布罗夫县小有名气，后来阿法纳西耶夫全家搬到了博布罗夫。据阿法纳西耶夫本人说，他对在沃罗涅日中学的七年学习生活，如同他对在博布罗夫那段生活经历一样，“很少留有令人愉快的印象”。令人生厌的死记硬背、墨守成规的中学教师、不堪忍受的体罚、同龄人的恶作剧、恶意中伤的流言蜚语、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斤斤计较、自私自利——这一切都有害于崇高理想的实现，但阿法纳西耶夫却找到了克服周围环境的惰性的力量。

1844年，十八岁的阿法纳西耶夫从七年制中学毕业后来到莫斯科，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四年大学生活成了阿法纳西耶夫进步思想形成的时期。在大学里，阿法纳西耶夫撰写了第一篇论文《彼得大帝时代的国民经济》（刊于《同时代人》杂志，1847年，第6、7期）。文章得到别林斯基的赞赏。别林斯基认为，这篇文章纯粹是一篇学术论文，是一篇“非常切合实际的文章”。<sup>①</sup>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有些事件往往会决定他今后的人生道路。阿法纳西耶夫在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叙述了发生在1848年9月21日的这样一件事：“莫斯科国民教育大臣叫乌瓦罗夫。

<sup>①</sup> 《1847年11月5日给瓦·彼·包特金的一封信》，见《别林斯基全集》（十三卷集），莫斯科，苏联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版，第7卷，第419页。

我们学校的学士们和大学生们当着教授、教育大臣和其他一些人的面宣读论文。我宣读了一篇关于国家（君主专制）制度对16、17世纪俄罗斯刑法发展的影响的短文……这篇论文引起了教育大臣的一番评头论足，然而，对他的评论我却并没有立刻作出表示赞同的反映。”<sup>①</sup>阿法纳西耶夫被认为是一个不适宜继续研究古代俄罗斯法律的人。“正教、君主专制、民族性”公式的提出者、沙皇政府的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真的动了肝火。甚至在与学者们的交往中，他也不那么彬彬有礼了。他曾对主讲俄国法律史的尼·瓦·卡拉乔夫<sup>②</sup>说：“您的讲课缺乏任何推论。您要一手拿着法律条文，另一手拿着卡拉姆辛的《俄罗斯国家史》，主要靠这些材料向学生灌输专制制度是俄罗斯历史的基础的思想。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是听卡拉乔夫亲口说的，”阿法纳西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证实了这一点。

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访问莫斯科大学后不久，处世谨慎、待人随和、洞悉官场情况的康·季·卡韦林<sup>③</sup>于1848年10月写信给不久前还是自己学生的阿法纳西耶夫：“您有个当考古学家的志向，但您应该打消这个念头。为了您本人，您必须这样做……。”<sup>④</sup>但阿法纳西耶夫不是一个能被困难所吓倒的人。

①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279号全宗，第1号目录，第1059号卷宗。

② 尼·瓦·卡拉乔夫(1819—1885)：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古文献学家、档案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883)。著有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著作，并整理公布了古罗斯法律文献。——译者注

③ 康·季·卡韦林(1818—1885)：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自由派社会活动家、政论家。参加了筹备1861年农民改革的工作。废除农奴制度草案的起草者之一。主张温和的资产阶级改良，维持权力无限的君主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译者注

④ 摘自格鲁津斯基的文章：《亚·尼·阿法纳西耶夫(传记)》。见亚·尼·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童话》，莫斯科，1897年俄文版，第1卷，第17页。

时隔一年，经尼·瓦·卡拉乔夫的斡旋，阿法纳西耶夫还是在外交部莫斯科档案总馆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位“年轻的档案管理员”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十年，直至1862年。从他发表在杂志上的大量论文和一些学术专著可以看出，这三十年来，他的闲暇时间他是怎样渡过的。然而，读者们所读到的阿法纳西耶夫的作品还不是他创作的全部，也不是作家希望创作的那种作品。阿法纳西耶夫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感伤心情：“当代的民间文学家，在他动笔写作时就已经预感到检查制度对自己的致命作用。他既希望能直抒胸臆，又希望能顺利闯过检查机关的大门。他得预先为思想的表达设计一种模棱两可的形式，遣词造句也得隐晦含蓄。只有这样，作家的真实思想才能得到隐隐约约的暗示，但作品的光彩随之荡然无存。”于是，他想出个办法：“如果谁想收集街头巷尾的传闻来写一部反映当代社会舆论的作品，想编选某些有趣的书信和受检查机关查禁的集子的话，我想，花它十年工夫，准能编出一部妙趣横生、大有教益的集子。”

阿法纳西耶夫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当时无论以什么形式都不可能发表的资料、事实和议论在他的日记中随处可见。阿法纳西耶夫的日记是一部反映当代生活的记录，它包含着阿法纳西耶夫的全部思想。这些绝对客观的记载在更高层次上反映了作者思想的真实面貌。

阿法纳西耶夫的日记证实他始终密切注视着任何有关废除农奴制的迹象。他的全部身心都被“农奴解放运动”所吸引。

阿法纳西耶夫的日记确实算得上是一部19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俄罗斯解放运动发展的生动而又详细的记录。1862年，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阿法纳西耶夫停止了日记的写作。

阿法纳西耶夫生活在俄国政局动荡的年代，对受压迫的农民深表同情，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强烈不满，他是沙皇制度的批评



者。他对僧侣们持蔑视态度，因为他深知他们在维护现存制度时所起的作用。所以，有理由这么说，阿法纳西耶夫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俄国解放运动的拥护者。

认为某种对立情绪使阿法纳西耶夫无所事事，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位俄国解放运动的旁观者，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在俄国进步人士的眼里，阿法纳西耶夫编撰发表一系列作品这就是勇敢的正义举动。1859年11月12日，阿法纳西耶夫写信给亚库什金<sup>①</sup>说：“目前我正在创作一部民间传说。作品的前半部份已送交检查机关，并顺利地获得通过。近日我将把剩余部份再送去。只有趁热打铁才行……”在《俄罗斯民间传说》出版4个月后，阿法纳西耶夫在雅罗斯拉夫尔写信给亚库什金，说集子出版如此顺利完全出于他的预料：“风言风语不少，但检查机关暂时还保持沉默。牧师们拚命骂娘，而僧侣们却在读，还赞不绝口。虔诚的妇人们自然也不太满意。”由《俄罗斯民间传说》出版而引起的风波久久没有平息。1860年4月，东正教行政总署首席检查官托尔斯泰伯爵对《俄罗斯民间传说》的出版提出抗议，他在写给教育大臣科瓦列夫斯基的信中要求“谴责出版界亵渎神明的不轨行为，维护宗教，维持道德”。而阿法纳西耶夫却在想着再次出版他的《俄罗斯民间传说》呢！俄罗斯革命的宣传者们高度评价《俄罗斯民间传说》的重要意义。就在1860年这一年，《俄罗斯民间传说》的伦敦版问世，而在俄国，再版的《俄罗斯民间传说》直至1914年才与读者见面。

后来，阿法纳西耶夫又编辑出版了《俄罗斯秘话》一书，此举更勇敢，因为作品对神职人员的批评更辛辣。阿法纳西耶夫写

<sup>①</sup> 亚库什金(1822—1872)：俄国作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著有随笔和短篇小说，抨击时政，文笔犀利。——译者注

道：“作品中的主人公最多的就是牧师。这里为幽默和想象提供了广阔的天地。”<sup>①</sup>《俄罗斯秘话》中的部分故事素材是阿法纳西耶夫从弗·伊·达里<sup>②</sup>那里获得的。达里在把这些故事素材交给阿法纳西耶夫时曾遗憾地说：“这些故事无法出版。太可惜了，这都是些非常有趣的故事。”

《俄罗斯秘话》最终还是出版了，但要是没有阿法纳西耶夫的参预，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那事情就很难说了。《俄罗斯秘话》的俄文版是在日内瓦出版的。据猜测，此书的出版与赫尔岑有关。

阿法纳西耶夫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他所编撰的《俄罗斯童话》这部力作中表现得最明显。阿法纳西耶夫本人深知他早在50年代初就准备动手创作的这部童话集的意义，也意识到此书的编撰工作工程浩繁，但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完成这项工作。他丢开了手头的其他一切工作，甚至暂时停止了他曾为之耗费了巨大精力的《图书论丛》的编辑工作。他在写给亚库什金的信中常常抱怨闲暇时间太少，并说：“应该写完这部童话集，这也是你的愿望。这将是你对俄罗斯文学的一大贡献。”（1859年11月12日）

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童话》创作于1855至1863年，是当时最完整的一部童话集（至今也没有一部比它更完整的童话集），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不可多得的精品。作品一问世就被看作

① 见《俄罗斯童话》，1936年俄文版，第1卷，第499页。

② 弗·伊·达里(1801—1872)：俄国作家，辞书编纂家，民族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38)。30—40年代用卡扎克·卢甘斯基的笔名写了一些具有自然派倾向的特写。还编有《俄罗斯民间谚语》(1861—1862)、《现代俄罗斯语详解辞典》(1—4卷，1863—1866)；1863年因这部辞典获彼得堡科学院荣誉院士的称号。——译者注

是俄国民主主义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对此书所作的评论是十分正确的（当时，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童话》才出了一半）。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在描写无个性人和鼓吹世界万物先定的愚蠢、傲慢的婆罗门式创作之后，创作开始转向揭示人的内心精神生活，且态度严谨，充满激情，尽管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这毕竟是令人愉快的。”照杜勃罗留波夫的说法，阿法纳西耶夫的作品“具有我们所有作品中常见的那种无法弥补的不足。不足之处就在于完全脱离生活原则”<sup>①</sup>（在受到严格检查的出版物中）。然而，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还是以其丰富的内容尖锐地提出了时代的社会问题。杜勃罗留波夫赞扬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集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阿法纳西耶夫从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中选取了许多档案中保存下来的童话故事，并增补了他从弗·伊·达里那里获得的童话故事素材。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集不是由某一地区的童话故事组成，而是一部全俄罗斯的童话集。这部童话集荟萃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阿斯特拉罕地区、弗拉基米尔地区、沃洛格达地区、沃罗涅日地区、叶尼塞斯克地区、喀山地区、卡卢加地区、科斯特罗马地区、库尔斯克地区、莫斯科地区、下诺夫哥罗德地区、诺夫哥罗德地区、奥伦堡地区、彼尔姆地区、梁赞地区、萨拉托夫地区、辛比尔斯克地区、坦波夫地区、特维尔地区和图拉地区的童话，以及俄罗斯其他各地和边远地区的童话。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集体现的是一个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纵横几千里的国家的童话。如果没有其他众多的科学、文化活动家的支持帮助，阿法纳西耶夫想创作一部汇集所有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集

<sup>①</sup>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九卷本），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1962年俄文版，第3卷，第232—235页。

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1852年，阿法纳西耶夫被选为俄罗斯地理协会民族学分会的会员，协会理事会于同年2月23日作出决定向阿法纳西耶夫提供该协会保存的所有童话故事档案资料。童话集的编撰出版成了俄罗斯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中意义重大的事件。

阿法纳西耶夫不失时机地着手工作。没有阿法纳西耶夫的辛勤劳动，俄罗斯童话的瑰宝极有可能失传，极有可能被埋没。经过许多世纪一代一代口头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到19世纪中叶进入了转折时期。当时，人们的创作思想受到社会新事物的猛烈冲击，完全符合世人口味的叙述故事的艺术越来越少见，人们渴望追求某种新的表现形式。阿法纳西耶夫以其创作为后代拯救了被忽视的有价值的民间艺术作品。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保持着足够的思想深度，表现人民道德情感的手法新颖别致，艺术想象丰富多姿，艺术风格鲜明独特。

只要一接触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我们就会高兴地发现：他的童话与俄罗斯其他一些文学巨匠的创作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似乎是他们作品中的民主根基的又一次显露。在《机灵的萨尔巴尔沙》中我们又见到了早就认识的熟面孔——普希金笔下的巴尔达<sup>①</sup>。把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与普希金的童话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不仅有相似的地方，而且也有不同之处：在

---

① 普希金的童话《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此童话是普希金根据在俄国民间广泛流传的关于神父的故事以及他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记录下来的故事提要写成的。由于这篇童话讽刺了俄国东正教神父的贪心和愚昧，歌颂了长工巴尔达的勤劳和机智，无法通过审查，因此在普希金生前未能发表，但在当时的文学界还是广为流传的。直到普希金逝世以后，才于1840年经诗人茹科夫斯基加以修改，发表在《祖国之子》第3卷第5期上。

——译者注

同一题材中对传统成份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然而，不尽是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还是普希金的童话，都追本溯源于一传统。

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伊凡王子和三姐妹》与普希金的另一个关于萨尔坦国王的童话故事<sup>①</sup>很接近，无论是关于国王偷听三姐妹谈话的情节，还是关于两位姐姐的嫉妒以及她俩所做坏事的情节，都很相象。在普希金根据老奶奶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的口述凭记忆创作的童话里，这些情节全都保留着，似乎更详细些。普希金对原来的民间故事作了改动，但民间故事原有的想象和风格还是表现得那么清新，那么明快。

在阿法纳西耶夫关于哥萨克和女妖精的童话中，我们可以见到尼·瓦·果戈理小说的传统。在童话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写：“半夜里，窗户突然打开了。窗外出现了一个女妖精。女妖精穿着一身白衣服，手里拿着一个洒圣水的刷子。她将手伸进窗里，刚想晃动刷子洒圣水，哥萨克立刻挥起马刀，咔嚓一下就将女妖精的手臂齐肩砍了下来。女妖精哎唷一声，像狗一样地尖叫着一溜烟地逃跑了。”天亮后，哥萨克才认出，这个女妖精原来就是教堂工友那生病的女儿。果戈理在短篇小说《五月之夜或溺死的女人》中也描写了同样的情节。他是借用了童话中描写

<sup>①</sup> 童话的全名是《萨尔坦国王、他的儿子光荣而有力的勇士格维东·萨尔坦诺维奇公爵和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这是普希金写的一篇最长的童话诗，长达一千多行。早在1822年他被流放在南俄基什尼奥夫时就记录过这篇故事；后来1824年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时，他又根据老奶奶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的口述记录下这篇故事的提要。1828年他最初想用诗歌与散文交叉的形式来写这篇童话故事，但到1831年8月在彼得堡皇村写作时，就全改用诗体，于1882年收在他的诗集第3册中。普希金的这篇童话诗以俄国的民间故事作为基础，同时又采用了法文译本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和法国奥努瓦夫人编写的《美丽的明星公主》故事中的一些细节。——译者注

鬼怪的某一情节。

在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火鸟和瓦希丽莎公主》中，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叶尔绍夫<sup>①</sup>的《神马》的痕迹：年轻射手捡到火鸟的羽毛，在神奇的骏马的帮助下捉住了火鸟；后来又去遥远的天边去寻找公主；最后，被抛入沸水中的射手变成了英俊的王子，国王却被淹死了——对于这一切，读者都很熟悉。

谢·季·阿克萨科夫<sup>②</sup>取材于民间故事的童话《鲜红的小花朵》与阿法纳西耶夫收入童话集的题为《菲尼斯特雄鹰羽毛笔》的童话实在太相似了，几乎每个细节都一样。再把阿法纳西耶夫的另一篇童话《独眼妖魔》与康·特·乌申斯基<sup>③</sup>的同名童话作一比较，两者在内容文字上的联系再明显不过了。

俄罗斯作家创作中的类似情况在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集中经常可以碰到。阿法纳西耶夫的同时代人、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以及后来步入文坛的其他一些杰出的俄罗斯作家如特·纳·马明—西比利亚克、马·高尔基、伊·阿·蒲宁、萨·亚·马尔夏克等，他们都曾借用过阿法纳西耶夫童话中的

① 彼德·叶尔绍夫(1815—1869)：俄国作家。《神马》是他的著名童话诗。  
——译者注

② 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56)。作品有自传体小说《家庭纪事》(1856)和《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1858)，真实地再现了18世纪末地主阶级的生活习俗。还写有狩猎笔记。他是一位热爱俄罗斯大自然的诗人——译者注

③ 康·特·乌申斯基(1824—1870/71)：俄国民主主义教育家，俄国科学教育学的奠基者。他的教育体系的基础是：主张国民教育民主化，教育要有民族性，反对专制，重视人的积极活动本质，承认劳动是生活和教育的要素。他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儿童世界》(1861)、《祖国语言》(1864)等初级读物和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人是教育的对象。人类教育学之经验》(1868—1869)及其他教育学著作中。1945年苏联政府决定设立乌申斯基奖章。——译者注

158180

形象与情节。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童话》丰富了俄罗斯民主文艺的宝库。

阿法纳西耶夫童话集的构思与特殊的科学诠释是彼此不可分割的。阿法纳西耶夫在着手编撰这部童话集时，曾打算将它作为一部“学术性”著作来写——“模仿格林兄弟的童话”。他认为，对童话文本作某些“必要的语文学和神话学的诠释”，把俄罗斯童话与其他民族的童话作一比较，这点很重要（1851年8月14日给克拉耶夫斯基的信）。由于童话集的一版再版，原来的诠释已被疏漏。这种情况的发生自有其原因，但决非说明这些诠释是站不住脚的。

众所周知，阿法纳西耶夫是用所谓的“神话学派”概念来解释俄罗斯童话的。这是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它的拥护者们认为，民间文学的发展进程取决于古代神话。他们简单地把民间文学作品的构思看作是对某些把自然界神化后所产生的概念和想象的表现，如太阳（所谓的“天文”理论）和雷电（所谓的“气象”理论）。

对于阿法纳西耶夫的观点，现代科学是无法苟同的，但阿法纳西耶夫对童话所作的许多具体、形象、恰如其分的解释却是不可忽视的。阿法纳西耶夫的一系列论文为后人开拓了一个足够广阔的研究探索的领域。用另一种总体眼光来看，阿法纳西耶夫的探索是极其有益的，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阿法纳西耶夫来说，理论上的偏差并没有直接损害他的童话本身的盎然诗意。他敏感地领悟到了童话故事的美妙与魅力。他曾感叹道：“……童话中隐含着真正的诗意和动人的情景！”<sup>①</sup>阿法纳西耶夫认为，童话旨在表现人民崇高的道德理想

① 亚·尼·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童话》序言；见《俄罗斯童话》，第三版，莫斯科，1863年俄文版，第13页。

和高尚品格：“……作为全体人民的创作，童话不能容忍对于善良与正义的丝毫背叛；它要求惩罚任何不义之举，表现善战胜恶。”<sup>①</sup>

阿法纳西耶夫抱着坚定信念编撰出版的童话集对他立足于俄国文化界大有裨益。阿法纳西耶夫的期望没有落空。早在编撰工作刚刚开始时，阿法纳西耶夫就听到了读者们的赞扬声。著名学者伊·伊·斯列兹涅夫斯基<sup>②</sup>在给阿法纳西耶夫的信(1855)中写道：“在喜爱我国民族诗歌的俄国读者中，有谁不在谈论着您？他们由衷地感谢您开始编撰俄罗斯童话，做了一件大好事！您在美好的时刻驾起船只，备足了缆索和食物，扬帆驶向浩瀚无垠的大海，当然，您从皇城运走的不仅仅是一件帝王华丽的紫红袍。愿上帝保佑您一帆风顺。”<sup>③</sup>

检查机关怀疑阿法纳西耶夫不可靠，于是在他家里进行了一次搜查。但是，阿法纳西耶夫不顾搜查后面临的巨大灾难，在朋友同仁的激励下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阿法纳西耶夫曾被禁止供职于国家机关。他花了3年多时间为寻找工作而奔忙，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杜马<sup>④</sup>书记员的职位，后来又担任调解法官会审法庭的书记员。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律系毕业生，阿法纳西耶夫希望有朝一日能被选为调解法官会审法庭的法官。但无论是他的这一希望，还是他生活中的其他一些打算，都没有

① 亚·尼·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童话》序言；见《俄罗斯童说》，第三版，莫斯科，1863年，俄文版，第14页。

② 伊·伊·斯列兹涅夫斯基(1812—1880)：俄国斯拉夫语文学家、民族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851)。写有俄罗斯语言、考古学、目录学、语言教学法、斯拉夫民族学、古俄罗斯文学史方面的著作。主要著作作为《文献中的古俄罗斯语言词汇资料》(1—3卷，1893—1912)。——译者注

③ 摘自格鲁津斯基的文章：《亚·尼·阿法纳西耶夫(传记)》。见亚·尼·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童话》，莫斯科，1897年俄文版，第1卷，第39页。

④ 俄国各种中央管理机关及地方管理机关的名称。——译者注



能够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打击接二连三——阿法纳西耶夫终于病倒了，而且病入膏肓。他在临终前不久写信给亚库什金说：“我现在一直咳嗽不止，痰也咳个没完。我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把痰咳完。由于咳嗽不止，我的胸部也开始作痛。天气又如此糟糕：阴雨连绵，一片泥泞，真叫人厌烦！”（1870年9月12日的信）时隔一年，阿法纳西耶夫于1871年9月23日与世长辞。

阿法纳西耶夫在逝世前实现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愿望——从原来的童话集中挑选出一部分童话故事专门为儿童出版了一部《俄罗斯童话》（莫斯科，1870年版）。阿法纳西耶夫从来就没有认为他的所有童话都适合给儿童看。阿法纳西耶夫的童话保留了地区方言的特征和某些细节。这些生活中的过时的知识会损害儿童的心灵。儿童版童话集则相反，它挑选了一部分更适合于作为家庭读物的童话故事。儿童版童话集的出版是最后一件令阿法纳西耶夫感到欣慰的事。在阿法纳西耶夫一生的最后一些日子里，沙皇政府的检查机关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让他得到过安宁。在1870年9月12日的那封信中，阿法纳西耶夫告诉亚库什金：“童话的出版工作已接近尾声，大概在下个月就能与读者见面。检查机关决不允许孩子们具有区分动物王国中雌与雄的概念……”愚蠢的书刊检查员把童话集中的“公马”、“母马”、“公狗”这些词通通勾掉，用“马”、“狗”取而代之。阿法纳西耶夫嘲讽道：“真可惜呀，关于公鸡和母鸡这篇故事没有撞到他们笔下；要不然他们该左右为难了——干脆改成鸟算啦。你瞧瞧，这帮道貌岸然的君子！”

当阿法纳西耶夫的儿童版童话集上柜供应时，反动的报刊杂志则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群起而攻之。结果使不少人认为这部童话集是一本与教育要求不相适应的有害读物。阿法纳西耶夫曾不无苦恼地询问过亚库什金：“在必要的时候是否可以寄